

笔
谈

罗斯高
史鹤凌
罗根·赖特
莫之许
长平
达隆·阿西莫格鲁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2期
2025年5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制度与发展：中国 是否在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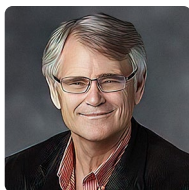
编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罗斯高 (Scott Rozelle,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以及全球影响力均显著提升。

然而，自 2012 年前后起，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人惊讶地发现中国经济似乎陷入停滞，难以复苏。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人们对中国当前体制下振兴经济的信心已逐渐减弱。本次圆桌聚焦谈论的是：政府的性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是否正在影响中国的增长、是否最终会将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架构理论至关重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但我在这里要探讨的，是另一个可能阻碍中国迈向高收入／高薪经济的因素。在我过去十多年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在我与娜塔莉·赫尔 (Natalie Hell) 合著的《看不见的中国：城乡差距如何威胁国家未来》 (*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the Nation's Future*) 一书中有扼要的总结），我们的研究提出的观点是冷峻的，是与“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这一主流叙事针锋相对的。我们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尽管上海与深圳闪耀的天际线展现了一幅现代繁荣的图景，但其光鲜的表象掩盖了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中国在 1980 至 1990 年代未能对庞大的农村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可能导致数亿人失去结构性就业能力，而这可能最终使国家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数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繁荣一直依赖充足的非技术型劳动力。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城市，在工厂、建筑工地及服务行业中从事低薪工作，支撑起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然而，随着工资上涨，自动化进程加速，许多这样的工作岗位逐渐消失。挑战性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完全没有为更高阶的经济

需求做好准备。据我们的估计，截至 2015 年，根据全国小普查数据，中国约 70% 的儿童（几乎全部在农村）从未上过一天高中——这使得整体劳动力人口（即 18 至 65 岁的所有人）的教育水平甚至低于墨西哥、巴西或土耳其等国家，即那些已陷入中等收入长达 70 年以上的国家。

我与同事及学生们所进行的实地研究，清楚地揭示了城乡之间鲜明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农村地区——那里仍居住着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教育机会历来非常匮乏（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这发生在大多数劳动力人口已经离校就业之后）。农村的小学和中学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资金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许多孩童从六岁起便需寄宿生活。即便有部分学生能读完初中，他们也多是不得不进入培训水平很差的职业高中。更基本的是，即便时至今日（尽管最近还有所改善），农村学生仍然面临始于幼儿教育阶段的种种障碍。由于营养不良、母亲与祖母等主要照护者缺乏育儿知识，0-3 岁儿童的认知发展、语言技能及社会情感能力都受到阻碍。

中国目前的发展轨迹与其他难以维持长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明显。东亚的龙头——韩国、台湾、新加坡——通过大规模投资教育与技能培训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则尚未完成这样的飞跃。如果不进行当务之急的改革（包括在学校、幼儿园及早期教育等方面），扩大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质量，那么中国就可能会陷入停滞，难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更令人担忧的是，作者们还预见，如果数亿中国劳工失去可取的就业机会，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他们推测，农村地区未受教育、失业男性的数量日益增加，可能会加剧社会问题。尽管某些预测或许尚属推论，

但这一整体论点——对人力资本的普遍投入不足构成了长期经济与社会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言晓义翻译）



史鹤凌（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 教授）：我这里将聚焦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劣及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举国体制”是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种国家主导型资源动员模式，即集中力量推动关键领域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新能源车和高端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中表现尤为突出。然而，作为一种发展工具，举国体制在不同情境下的优劣势差异显著。我的看法是，作为技术追随者，举国体制具有显著优势；但若成为技术引领者，其本质劣势将限制中国的长期发展。

举国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高效的资源整合和快速执行能力，尤其在技术追赶阶段。以新能源车为例，2014年6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宣布，将开放公司所有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善意”使用这些技术，不予追究专利侵权责任。这一举措包括电动车核心技术，如电池管理系统（BMS）、充电技术等。

以此为契机，中国通过政策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如充电网络）和产业规划，在短短十余年内从边缘玩家跃升为全球领导者。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60%以上，比亚迪等企业跻身世界前列。政府通过设定明确目标（如2035年新能源车占比50%）并辅以财政支持，迅速构建了从电池到整车的完整产业链。这种集中力量突破关键环节的能力，使中国在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展现了举国体制在追赶阶段的威力。

高端芯片的研发和制造，举国体制则完全没有体现出优越性。芯片产业需要长期的基础研究和生态系统支持，而举国体制更擅长集中攻关具体目标，却难以孕育原创性突破。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等机制投入了数百亿美元，扶持企业，如中芯国际（SMIC）、长江存储（YMTC）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能算是成功。例如高端芯片（如 5 纳米以下）的制造需要极紫外光刻机（EUV），目前仍被荷兰 ASML 垄断，且中国无法采购。即使通过“多重曝光”等技术绕过 EUV，中芯国际的 7 纳米工艺在良率和成本上仍不具竞争力。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在高端设计和制造上的经验与美国、韩国、台湾相比仍有差距。只能靠挖角国际人才和拷贝别国技术来弥补。而中国尽管投入巨资，仍在光刻机、EDA 软件等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举国体制倾向于“短平快”的成果导向，可能牺牲长期积累，导致在技术前沿的引领能力不足。

此外，举国体制的财政负担和效率问题也不容忽视。新能源车早期补贴催生了“骗补”乱象，高端芯片领域则因重复投资和低效项目浪费了巨大的资源。这种模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持续，尤其当财政压力加剧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现在说说举国体制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因创新不足或产业升级停滞而无法迈向高收入阶段。中国目前人均 GDP 约 1.2 万美元，正处于这一关键转折点。举国体制能否帮助中国跨越这一陷阱，取决于其在高科技产业中的表现。

作为追随者，举国体制通过新能源车等产业的成功，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这些高附加值产业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全球竞争力，还创造了就业

机会。例如，新能源车产业链涵盖电池、电机等技术领域，带动了相关制造业发展。然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还需解决创新能力、收入分配和制度效率等问题。举国体制在高端芯片等领域的受限表明，其在原创性创新上的短板可能拖累长期发展。若无法从追随者转型为引领者，中国可能陷入技术依赖和高附加值产出不足的困境。

举国体制能持续吗？它的可持续性与其适应性密切相关。在追赶阶段，其高效性和集中性无可替代，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引领技术前沿成为新目标，举国体制需转型。新能源车产业的案例显示，补贴退出后，市场竞争推动了比亚迪等企业的技术进步，而依赖政策的企业则被淘汰。这表明，举国体制需逐步让位于市场机制，以激发企业内生创新动力。

高端芯片的经验则提示，举国体制在基础研究和生态建设上的不足可能成为长期瓶颈。美国、日本、荷兰、台湾等通过产学研结合和风险投资驱动芯片创新，而中国若继续依赖政府主导，可能难以突破技术天花板。此外，财政可持续性也是挑战。新能源车和芯片产业的高投入若无回报，可能加剧债务压力，威胁经济稳定性。

综上所述，举国体制在中国作为技术追随者时展现了显著优势。然而，当目标转向技术引领时，其本质劣势——创新单一性、低效性和基础研究不足——成为制约因素。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举国体制能在短期内通过产业升级助推经济，但长期跨越需依赖原创性创新和市场化改革。在可持续性方面，举国体制需从“全能政府”向“引导型政府”转变，减少直接干预，更多通过政策激励和生态培育释放市场活力。只有在这种动态调整下，中国才能借助举国体制跨越陷阱，并实现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型。

但现行的政治体制，缺乏这种转型的动力和机制，因此前景堪忧。



罗根·赖特 (Logan Wright, 荣鼎咨询合伙人、《中国经济已经登顶》报告作者): 中国经济的放缓是结构性的，

而其金融体系的国家主导性质正是造成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它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中国金融体系的扩张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关联一直被低估。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数年中，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单一国家信贷扩张。本轮信贷扩张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前后达到顶峰，而它的结束带来了投资增速的急剧放缓，尤其体现在房地产建设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支出方面。

中国过去由国家主导的爆炸式放贷，如今正在限制其未来的经济增长。现在如切断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就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并会进一步减少已经开始下滑的政府财政收入。继续走当前的老路，则只会导致持续的停滞，新的信贷和财政支出带来的投资效益日益递减，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偿还既有债务。

这一过程并非中国当局有意为之，但隐性的国家担保使得信贷扩张得以持续，远远超出了新投资的生产力水平。道德风险和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在中国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种经济扩张的战略。只要贷款人认为借款人不会倒闭，扩张信贷和投资就变得愈发容易。如今，尽管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作为主要借款人面临偿债困难，但这些贷款在账面上仍被标记为“正常贷款”。然而，为了维持信贷的“正常”状态，就需要不断注入新的信贷，这反过来削弱了中国将投资转向更具生产性领域的的能力。中国难以迅速调整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方向，因为银行一旦这样做，就会立即面

临旧贷款的损失。

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中国财政和金融体系的衰退，这种衰退已开始拖慢经济增长。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无法采取果断措施来应对这一衰退、提升银行和财政系统的效率？因为衰退不会生成一份备忘录，也不会制造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它只会以一种缓慢的方式侵蚀政策的有效性。相比之下，采取行动拯救金融体系、或迫使个别贷款人或借款人承担损失的做法则是主动的举措，会立即带来风险。

中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放缓，以及当局无法调整其增长模式的现实，共同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顶峰。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国如果不能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就无法维持投资主导型经济。而要扩大出口份额，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必须减少投资、削减就业与产出。中国如今的增长主要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这一事实也阻碍了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进一步扩大其份额。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实力达到顶峰，而其持续的结构性放缓，正是多年信贷快速增长累积成本的副产品，这一点远远超出了中国政府最初的设计或预期。（言晓义翻译）



莫之许（中国网络专栏作家、《华夏时报》前评论部主任）：

中国显然不是包容性制度，然而却在这几十年里持续经济发展，并实质性改善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这无疑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的观点提出了挑战。阿西莫格鲁对此有所回应，大致还是用后发优势，亦即模仿带来的追赶型优势或发展作为解释。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解释。

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后发优势是所有后发国家都具有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持续且相对包容的发展。此外，中国制度具有攫取型特征也是公认的事实。其实，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有樊纲、钱颖一等本土学者提供解释，比如边缘 / 增量改革、地方竞争 / 财政联邦主义，这些解释旨在说明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或制度安排，提供了相当的经济自由和竞争。秦晖则用低人权优势解释中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即通过压低劳动者的权利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但所有这些解释都未能从根本上回答对《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观点的质疑，亦即，非包容性制度何以能够带来长期经济发展。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改善了中下层民众生活，但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占比一直非常低下，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体制的非包容性或攫取性。那么，为什么非包容性经济仍能发展？我的理解，除了上述解释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更宏大的结构观点，亦即：尽管是非包容性的制度，仍可以通过制度安排，系统性地形成一种有利于企业竞争和发展的重商主义体制，而在特定阶段内实现经济发展。

这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在极权党国体制的政治约束和推动下，由党国体制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其次，通过系统性地压低要素价格和各种成本，让制造业尤其是外向型制造业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最后，由于发展起点低，中下层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绝对改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相对剥夺。

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低人权优势的另类表述，因为压低某些要素价格和成本往往与低人权一体两面，但并非所有被压低的要素价格和成本都与低人权

相关。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秘诀在于：体制通过其政治意志作出相应制度安排，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重商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党国体制通过财税、金融和垄断价格等手段系统性地攫取了发展成果，企业在重商主义庇护下获得了发展，而民众虽然相对被剥夺但在这一阶段获得了相对改善，因此，表面上看，这样的安排似乎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换一换角度，可能就并非如此了。首先，党国体制的攫取形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如现行的退休、医疗制度。

其次是经济失衡，最近热门的 overcapacity（产能过剩）问题亦即制造业占比和消费占比的落差，以及高企的债务比，意味着中国经济存在重大隐患。一旦外向型制造业无法消化其产能，与之对应的各种投资归于无效，就可能形成债务危机，届时，目前债务压力下的通缩趋势很可能转变为强烈的通货膨胀，现行模式或将迎来总清算。

此外，非包容性制度下的发展对民众来说并非没有负面效应。相对剥夺之下，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近些年低落的生育率、躺平、润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种模式的弊端。出生贫苦的前几代人可以满足于相对剥夺下的绝对但有限的改善，但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在小康中成长的新生代却注定不可能重复前几代人的行为模式，而失去了这样的行为基础，也就抽掉了中国非包容制度发展模式的动力之源。

对此，很多人开出了改善分配结构、提高消费占比的药方。这从经济学等式来看似乎成立，但如上所分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即建立在系统性扭曲之上，改变分配意味着整个模式的改变。由于极权体制需要全面控

制乃至占领一切社会领域，由此需要配置超级全能的体制，以及超高官民比和超高比例国有资产，导致更多利益流向了党国体制集团。改变分配比例意味着改变这个超级体制，需要的是政治变革，而不是政策调整。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改善分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在政治变革之前这根本就是个伪问题。而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改变，随着外部环境和民众行为模式的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可能戛然而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或许并未真正挑战《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观点，而仅仅是在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安排实现了发展。而从更长时段来看，这一发展很可能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巨大的危机。从更长的时间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就不是“成功的”，而是“失败的”。



长平（《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

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

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

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



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教授、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感到荣幸和欣慰的是，《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在关于不同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中，仍然受到重视。

中国一直是我们理论框架中的一个棘手案例。早在 2012 年本书出版时，非常明显，中国是一个异常专注于经济增长的、自上而下（掠夺式）的政治体系。在过去的十三年间，更明显的是，中国的目标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着眼于创新与技术领先。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实验。尽管苏联曾经一度尝试在个别领域谋求领先，但它总是半心半意且范围有限。中国则雄心勃勃，力求在大多数关键经济领域内实现全球领先和创新突破。

以上专家之间的对话充满了深刻的看法与独到的视角，体现出参与者对中国现状深入的理解。

所有这些观点中有一点是共通的，我对此也深表赞同，即中国存在着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但另外一点也是明显的：中国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涵盖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甚至机

器人等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视作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所塑造的结果。一方面，在银行业、房地产，尤其是制造业领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导致资源错配及低生产率；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工程师和受过良好技术训练的青年群体，他们在政府大力的财政支持、数字应用数据的广泛供给，以及规模化生产机会的支持下，正积极推动众多行业的创新。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的博弈，将决定中国是上升到全球技术领导地位（或共同领导地位），抑或是陷入一种明显低于美国和其他最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的状态。

不过，在判断这一进程最终走向何方时，有五个紧张关系 (tensions) 不能忽视：

第一，资源错配同样也出现在学术界和科研过程中。政府深度介入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这不仅是一个资源和方向完全由上而下控制的实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权力甚至深入到学术领域以及最具创新力的企业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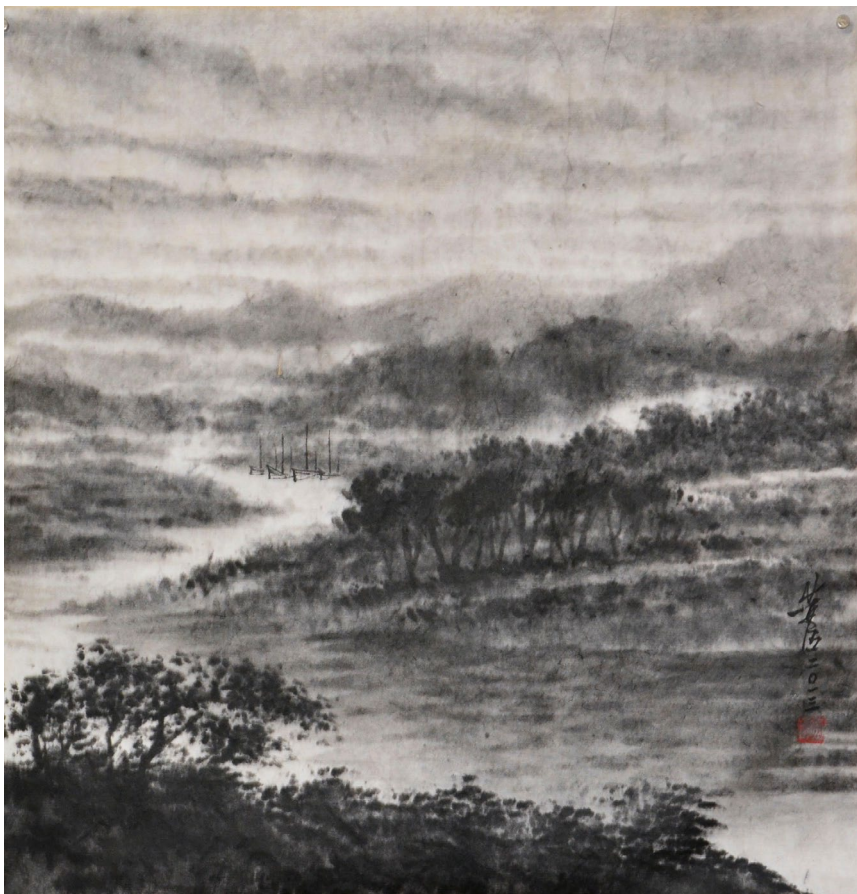
第二，中国仍然是两个经济体并存，即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状况可能会拖累整体经济发展，并进一步加剧资源错配和结构性问题。

第三，由于自身政策上的失误（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这将带来沉重负担。曾经涌现的大批热衷于投身技术领域并愿意在创业和初创企业中承担风险的年轻群体，其活力将在

未来逐渐减弱。

第四，中国尚未成功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目前中国出口部门更具活力，而消费率（消费占 GDP 的比重）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仍然非常低。实现这种转型对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增长至关重要，而这一转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政治领域。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意味着必须赋予中产阶级更多权力和更积极的角色，但这对中共的政治主导地位而言无疑将构成威胁，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共领导层的充分认识。因此，经济重心转型的过程究竟会如何展开，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美中竞争可能迫使中国犯下更多错误，并进一步暴露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中其他潜在的弱点（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这一竞争将如何演进，目前也存在诸多未知因素。（余浩风翻译）



黄奕信画作